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2006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集/谢永康主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743-089-6

I. 2... II. 谢... III. 社会科学—科技成果—宁波市—2004-2006

IV. C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9363号

2004-2006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集

出版单位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邮编:315000)

网 址 <http://cbs.cnnb.com.cn>

电 话 0574-87287264(编辑室) 0574-87289976(发行部)

印 刷 浙江上虞印刷有限公司

主 编 谢永康

责任编辑 王松见

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735 千

版次印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089-6

定 价 57.00 元

目 录

宁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发展趋势及思路(代序)

..... 宁波市社科院(市社科联)课题组(1)

·论文·

从浙东区域文化和浙东学术文化解读宁波精神 潘起造(1)

“宁波精神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特征”研究报告 屠文淑(20)

史蒙卿与静清学派研究 张 伟(33)

四明文学批评形态研究 华建新(50)

农村全面小康与滕头发展模式研究 陈利权等(65)

宁波市农民工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邵金菊(84)

建构宁波城市特色的理论、方法和思路 陈依元等(92)

未来几年城镇居民消费趋势的分析研究

——以宁波为例 谢阳群 吴欣欣(110)

休闲学视角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宁波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张雅静等(128)

宁波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 林承亮 蔡水华(147)

加强宁波服务业招商引资的对策研究 白泉旺等(171)

宁波市保险产业组织的演进与优化研究 邱 波等(190)

宁波会展的特色、管理模式及发展对策研究 黄 焱(212)

宁波基层党课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课题组(239)

·论文摘要·

明代宁波商人研究 钱茂伟(251)

刘宗周与黄宗羲学术递嬗研究(节选) 方同义 张瑞涛(258)

早期欧洲地图上“宁波之角”的形成 龚纓晏(266)

慈城望族文化的影响力 杨馥源等(272)

还原《孟子》太和气象

——论黄宗羲《孟子师说》对《孟子》解读 张实龙(278)

“南田悬岙——丹城——定关”

——张苍水在象山的一段押解线路 张利民(284)

百年家族的辉煌及其启示

——小港李家研究 孙善根(292)

为我国教育理论界的“永远的丰碑”树碑立传

——解读《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 喻立森(298)

《德伯家的苔丝》的叙事与悲剧效果 方 英等(305)

宁波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对策研究 鲍展斌(312)

宁波民间戏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贾小鹏(319)

甬籍音乐家群体与中国音乐教育 沈浩杰(328)

宁波政府制度创新深化研究 何俊峻(337)

宁波建设现代服务型工商行政管理研究 熊 彬 于立平 邓小河(345)

乡镇财政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研究 楼百均(350)

基于GIS&RS的宁波周边城市群研究 叶 明等(362)

宁波都市化发展战略研究 赵全军(369)

宁波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战略研究 叶文涛(376)

制度构建:民营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机制研究 郑曙光(387)

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与行为策略研究 陈传锋等(396)

宁波市城市化进程中失土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和对策分析
..... 赵海平等(402)

WTO与地方经济立法 金 潮 刘晓明(411)

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研究

——兼议合同法的开放性发展趋势 裴士俊 王惠之(419)

加快宁波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周耀烈(428)

杭州湾南岸滨海平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变化研究

..... 李加林 龚虹波(436)

宁波帮与近代中国金融业 江彦等(445)

对策存在的基础和金融改革区域对策模型 贺刻奋(454)

私人权益资本市场基本问题研究

——兼论宁波发展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现实可行性 孙伍琴(462)

加强宁波金融生态建设,增强地区资金吸纳能力

——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 何振亚(474)

构建面向结果的集中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宁波构建现代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宋玉池 励惠红 王海虹(482)

现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	何心展等(491)
全面推进港桥海联动的战略思考	陈洪波 王志新 徐 菁(499)
宁波人才竞争力评价模型及其比较分析	朱顺林(505)
宁波市房地产泡沫实证和对策研究	徐一萍(514)
宁波市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研究	范世清(523)
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基本规律研究	董 瑛(530)
后 记	(537)

论文

从浙东区域文化和浙东学术文化 解读宁波精神

潘起造

【摘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宁波人之所以能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因为宁波人在弘扬这些精神时,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学术文化作底蕴的。古越文化励志图强的精神、沿海文化开拓务实的精神、浙东学术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阳明心学所倡导的主体自觉精神,是宁波地域文化中古往今来代代相传的四大人文传统。当代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就是在传承这四大人文精神基础上发扬光大的。从与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关中文化、温州文化的比较中,可见宁波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的特色。

【关键词】宁波精神 浙东学术文化 地域文化 比较研究

近年来,经全市上下的共同探讨,宁波市以“诚信、务实、开放、创新”来作为“宁波精神”的概括。但必须看到,以这八个字来概括“宁波精神”,如果仅仅从宁波目前的发展现状中去说,还不能说它就是宁波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的表述,因为以这八个字来概括其他一些城市的精神也同样合适。因此,本课题的研讨,并不是在于论证这八个字正是“宁波精神”,更不是为了说明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要比其他地区的更出色,而是试图通过对宁波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考察,从而探讨宁波地域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再来透视宁波人在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这些当代中国人共有的优秀品质时,有哪些优势和局限。

宁波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宁波人文精神,它既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又受中原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既具有商贸文化的丰富内涵,又秉承儒家文化的基本传统;既渗透古代越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呈现在宁波人身上“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是具有自己区域文化丰富内涵的。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尤其是明清以来,浙东学术文化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创新的社会背景,在学术思想上引领中国时代发展的潮流,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主义大门;当代宁波人的求真务实、自我奋斗、与时俱进、诚信循礼的精神,是与浙东学术文化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宁波人在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这些精神时,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学术文化作根底的。

一、从浙东区域文化的四大文化传统中探究 宁波精神的文化渊源

就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文化素养一样,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城市人文面貌,即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渗透于这个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和塑造着这个城市的形象。

从孕育和塑造人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宁波精神,就是指宁波人在处世立身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有的基本人文精神。它是宁波人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精神品格,是宁波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它体现在宁波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动。它既以观念形态、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宁波市民的精神层面;同时也表现在市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宁波精神从本质上说,它是宁波人的一种文化认同。

自古以来,宁波人杰地灵,精英荟萃,历代各类人才如群星璀璨,在不同领域涌现了时间跨度较大的大批人才精英群体。例如:

以杨简、王阳明、王应麟、黄震、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为代表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们创立的“四明学派”、“阳明学”、“浙东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乃至日本、东南亚都曾有过重大学术影响。

以朱舜水、张支信、龙室道渊、周文楷等为代表的学者、航海家、商人、医学家等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等,对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严子陵、史浩、方孝孺、朱舜水、钱肃乐、黄宗羲、张苍水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们,以行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灵魂,为世人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以阚泽、虞翻、虞世南、传古、胡三省、戴表元、袁桷、张可久、林和靖、吴文英、王谔、吕亿、杨简、丰坊、沉明臣、屠隆、叶宪祖、吕天臣、朱舜水、黄宗羲、沈光文、姜宸英、万斯同、裘琬、邵晋涵、仇兆鳌、全祖望、姚燮等为代表的书画、戏剧、诗词、文史经学等方面文化人极大地丰富了全民族的艺术瑰宝,并占有重要地位。

以虞喜、释奉真、黄济之、宋北川、高武、赵献可、黄宗羲、陈藏器、日华子、陆士逵、黄百家、邵昂霄等为代表的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们创造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科教成就,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以祖阐、契比(布袋和尚)、知礼、普济、许子元、梵琦、敬安等高僧为代表,创立了传及全国乃至日本、朝鲜半岛的临济宗与曹洞宗,为弘扬普及中华佛教及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楼郁、陈谧、史宋之、楼钥、袁忠澈、丰坊、范钦、范大澈、黄宗羲、万斯同、陈自舜、

陆宝、全祖望、卢沚等为代表的大藏书家们,他们的千秋伟业;为进一步滋养推动浙东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在当代,宁波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涌现了举世瞩目的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商贸实业人才群体;以宁波籍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教精英群体;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营管理人才群体;以“顺其自然”为代表的慈善爱心人士群体,等等。^①

古往今来,宁波地域之所以能涌现如此众多的利国利民、济世经邦的优秀人才,说明在宁波的地域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哺育人们励志奋进、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正是宁波的这种地域文化精神,或者说是宁波精神,使宁波成为人文渊薮的文献礼仪之邦。那么,能够称得上是宁波精神的理念是什么呢?这就首先需要从区域文化的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从特定的地理区域特性中透视浙东区域文化的生成背景、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形态,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宁波文化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都是有其传统的,以浙东区域文化为根基的宁波文化,其形成、发展、传承也可以从远传统、近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这几个方面来说。

(一)所谓远传统,就是处于文化“轴心时代”的古越文化,为宁波文化留下了“励志自强”的文化“基因”

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文化发生论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是人类精神产生的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思想史上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这个时期。^②同时他还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③。以此观点来思考浙东文化也是合适的。距今30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正处于中华文化形成的“轴心”时期,它和中原的儒家文化一样,同样会对中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浙东区域文化来说,吴越文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吴越文化孕育了浙东文化个性的基因。浙东地域文化,正是在传承吴越文化,更进一步说是在传承古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务实、开拓可以说是浙东文化、包括宁波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从古越文化的不屈不挠、励志拼搏的精神中传承而来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心理特征,积淀在浙东人士的思想观念中,在后世产生着深刻影响。

从河姆渡文化算起,古越文化至少已有七千年的历史;从《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十四年(公元前1029)“于越来宾”算起,越地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七千多年前的越地,滨江临海,全境多为草泽丘陵。山洪、潮汐与出没于林莽、湖泽间的虫蛇兽

① 引自<http://www.cnnb.com.cn>(中国宁波网)。

②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版。

③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版。

类,相继侵袭为害。“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①人口稀少,环境恶劣,使越地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夏少康封无余到此,以奉禹祠,其时这里仍是一片蛮荒之地。在当时中原国家的眼里,越地一直被视作未开化的夷狄之邦,直到越王勾践时这种情形亦未根本改变,有所谓“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②。越至越王允常、勾践而国势日强,但北方吴的存在严重威胁越的生存,“夫吴之与越,仇讎敌战之国……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③

险恶的自然环境,强国压境的生存条件,迫使越人将谋求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的特有品格,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局势中磨砺、孕育而出。

首先是励志图强的拼搏精神。古越初,越人具有一种原始的顽强不屈的野性,在漫长的历史衍进中,这种野性逐渐演变成成为一种好剑善斗的地域风气。当这种原始的好剑善斗的精神在越王勾践之世被引向战胜强敌、洗雪国耻的时候,便成为一种励志图强的生命力的象征。这种古越之风在代代传承中凝聚为越地人们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即当事关民族大义时临难不苟的精神追求。宋明两朝晚期,异族入主中原、河山破碎之际,与清代末叶,革命起事四方酝酿之时,越中特多殉难死节或发难倡义的人士,便是这种文化精神高扬的结果。

二是具有开放和尚武的精神。越文化形成于吴、越的不断征战之中,越国在越王勾践继位后,重用四方贤良,招揽四方人才,并学习楚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使经济和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越与中原一样出产青铜器,但中原的青铜器多是礼器,而越人却用它制造了锋利精致、享誉天下的剑戈。诚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之时,除了武器的优越外,尚武精神也十分重要,而这种尚武精神在越人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三是理性务实的精神。越地荒瘠,国小势危,无论是生存繁衍,或是图强雪耻,皆须寄于步步踏实的辛勤劳作与点滴力量的切实累积之中。越人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天象观察,讲究规矩绳墨,这些都直接源于长期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经验。越国在春秋之世已建起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台。《越绝书·卷八》记载:“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仰望天气,观天怪也。”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唯重稳实,唯求解决为现实逼到眼前的具体目标任务,遂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④

所以说,“励志自强”是处于“轴心时代”的古越文化遗传给浙东人们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虽在浙东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但是,我们从和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相比较中,从几千年来浙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中,可见浙东地域文化是深受这种文化精神影响的。鲁迅先生就不止一次引用前人的话说“会稽非藏污纳垢

① 班固:《汉书·地理志》篇(卷八下),中华书局1959版。

② 《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

③ 《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

④ 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版。

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励志自强”就是越地文化(也即浙东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作为浙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宁波文化自然也是在传承这种文化基因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二)所谓近传统,就是唐宋以来的浙东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宁波文化培育了开拓务实的人文精神

浙东地域文化除了秉承的吴越文化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浙东特殊的地域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浙东文化不是单一的大陆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海洋文化,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沿海文化。

大陆文化指以大陆为背景产生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二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大陆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业生产需要遵守自然节气,依赖天时地利,使人们从探索自然规律中养成遵守规则、顺从命运、服从统治的习性;而日常生活中对于家族的依赖以及水利灌溉的互利作用,又使人们增强了群体观念,但也往往容易造成封闭性和保守性,产生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容易接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所以大陆文化虽然厚重、精致、典雅,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海洋文化则是一种商业文化,由于它产生的背景是大海,所以包含着大海的许多秉性:大度,有大海般的胸襟与宏大的气魄,给人们以豪情、信心与力量;创新,大海亘古常新,既有周而复始,更有气象万千、沧海桑田的特色;包容,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由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使浙东的地域文化一方面生发出海洋文化才有的开放特质,另一方面又由于和内陆紧密相连而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因此浙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说是把海洋文化融入大陆文化之中的沿海文化。如果说吴越文化是浙东文化的根,那么,沿海文化则是浙东文化的魂。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浙东地处沿海环境和亚热带气候,浙东地域与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为邻。出海捕鱼、滩涂养殖是浙东人的主业之一。海洋,不仅是宁波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而且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源。海洋对于濒海而居和以航海谋生的宁波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孕育了宁波人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强烈的对外贸易意识是地处浙东沿海的宁波人在生存环境中自然地孕育出来的。

在宁波的发展历史中,因港市而勃兴的特点非常明显,它从建城开始起就是一个港口城市,港口的兴衰变迁对宁波城市能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宁波是中国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城市之一。它的海外贸易约始于秦汉时期,是比陆上丝绸之路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要求和外来文化的交互作用下,这种开放意识逐渐定型。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宁波人成为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宁波商帮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在浓浓的商贸文化中,宁波人充分体现了浙东传统文化性格中那种地缘凝聚精神、自强自主精神、开拓精神和求实精神。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机遇,精于企业管理,能适应时代潮流,使浙东文化中的经世务实精神呈现出一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风貌。

同时,宁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冬季,各种越冬作物仍然能继续生长,处于稻作文化圈内的耕作环境对宁波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是有深刻影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经指出:“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在东亚人口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它从公元8—10世纪起为世界这部分地区的文化输入了新的生命力”,“与特有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具体说来,这种“特有的生存方式”意思是,人们常年忙碌,没有连续或固定休息的观念。水稻是需要精耕细作、细心照料的,从播种到收获,加上轮作,一年到头都有事干。这种常年的劳作造就了宁波人的实干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这种实干特性,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浙东地处东南沿海地区,一方面面临大海四通八达的生存环境,使浙东人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精神,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则培育了浙东人民自主自强的精神;另一方面,农耕生活又是古代浙东社会的基本状态,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在浙东人民身上代代相传。所以海洋文化的开拓自强精神和农耕文化的务实精细精神,在浙东区域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从而形成开拓、务实的人文精神。

(三)所谓大传统,就是浙东士人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为宁波文化高扬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

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产生以后,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追求。所谓“经世致用”,就是经邦济世,是指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建功立业,以企求达到天下太平的一种精神、情操和理想。

儒家传统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中心逐步南移的问题。晋朝时期已出现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五代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大量文人南下,再次出现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彻底南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的繁荣,浙东学术文化的底蕴由此而来,使浙东文化有“人文渊薮”优势,“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对此,全祖望曾赋诗曰:

鲒埼亭下是侬家,雪后沙螺旧所夸。

浙东列城虽褊小,风俗由来拟邹鲁。^①

自从南宋建都临安,“直把杭州作汴州”,大批来自中原的贵族显官和士夫文人移居甬上,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儒学大家和学者、诗人。故而全祖望颇感自豪地说:“南宋儒林五派,俱萃于此,叹为盛哉!”^②“吾乡远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阙略。有宋奎蚨告瑞,大儒之教偏天下。”^③明末清初,“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蔚然”^④,崛起了一个以黄宗羲和万氏兄

① 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十、卷三。

② 全祖望:《勾馀土音》卷三《苕庭招游城东即赋东阜》。

③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淳熙四先生柯堂碑文》。

④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永乐宁波府志题词》。

弟为代表的新的浙东学派。黄宗羲“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并说:“甬上多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①

如上所说,浙东山川灵秀,既是传承历代先贤的学统和文统的学术之乡,又是“忠义之邦”。这使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在浙东文化中(包括在宁波文化中)得以薪火相传。历代的浙东学术的思想家,都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功,要求文化、学术之事必须服务于国计民生。宋代,陈亮、叶适曾和朱熹进行过“义利之辩”的激烈交锋,强调义理须见之于事功,反对虚文空言。至明代,朱舜水力主“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②;“圣贤之学,俱在践履”^③,这一思想发展到清代,成为我国文化学术界的主导思想,成为浙东学者经典的治学原则。黄宗羲在著述中,反复论述了“经世致用”的为学原则,明确地把“经世致用”概括为“学贵践履”^④。在他看来“儒者之学”,“经天纬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⑤。黄宗羲之后的几代传人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都忠实地继承、发扬了这个学术原则。

总之,经世致用、注重实功是浙东文化学术思想的精髓。浙东学术的精神当首推经世致用,对此,各个时期学者都有肯定。黄宗羲就是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辐后足以应务”^⑥为治学宗旨的;梁启超认为“史学经世”是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⑦陈训慈先生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中把浙东史学的精神概括为: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同样把经世务实作为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⑧

(四)所谓小传统,就是明清时期阳明心学在浙东的兴起,强化了宁波人文精神中的“主体自觉”意识

浙东区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精神传统,是不靠天不靠地、自作主宰的主体性精神。从理论形态上说,这种自主精神在阳明心学那里得到了精致表达。阳明倡言“心学”,曰“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⑨“吾心”“良知”乃是宇宙的“天渊”,万物的“主宰”,“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⑩阳明此说应用于学术创造,就是认为:纵有花花世界之万千事物,府库收藏之无数资料,古今中外之学术巨擘,皆须经“吾心”之理性良知做出裁断、抉择,孰是孰非孰醇孰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得创造。“吾心”乃学术之最高

①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三十《黄宗羲小传》。

②③ 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顺问》,中华书局1981版。

④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册)·今水经·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版。

⑤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题解》,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版。

⑥ 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编》卷十九《甬上证人书院记》。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版。

⑧ 《史学杂志》1931年一卷五、六期。

⑨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八《书诸阳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⑩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七《紫阳书院集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权威、最高标准。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①在王阳明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珍贵在于“得之于心”的独特创造,这种创造高于一切既定的权威。王阳明这个说法为明清浙东学人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浙东文化强调学术的主体性,强调创新,主张学问贵在“自得”(王阳明语),成一家之言。继王阳明之后,浙东几代学人均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对人的身心解放的认识。黄宗羲一方面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开启人们对于主体身心解放的领悟。他大胆宣称:“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另一方面黄宗羲也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论证了人主体自觉的合理性。他指出“盈天地皆心也”。在他看来,人的主体精神“心”是最根本的,世上运行的“气”与“理”都与之相通,“穷心”便可“穷万物”。全祖望积极倡导“不任命”的人生意识,努力摆脱所谓天命运对主体身心解放的精神压迫。他还提出“学道在爱人”的重要观点,强调了人对于世界的中心地位。章学诚明确反对抑制身心解放的愚昧的天命观,根本不相信所谓长生不老之说,以为那是迷信的无稽之谈,真正能长留于世的是大觉大悟的主体精神。这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对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主体所起能动作用的肯定。章学诚认为,人需要不断地提升主体的自觉意识,从而保存可贵的“真我”,如此人生的价值才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还认为“圣人”与“凡人”的人生价值各有千秋,“凡庶”若有了自觉的意识,又肯下苦功学习,同样可以实现辉煌的自我价值。

浙东学人讲究学问的“自得”,不仅要超越他人,而且要超越时代。讲究自得的实质就是创新,是面对社会的实践,“通经致用”,从而求真求实,发现“实理之所在”。求真求实是浙东学术的优秀传统。

从以上对于浙东区域文化的所谓远、近、大、小这四方面传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浙东文化为根基的宁波文化是有丰厚的底蕴的:从文化传统的源头上说,古越文化的务实进取精神可以说是浙东文化,也即宁波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而儒学文化所秉承的道德精神以及阳明心学所激发的主体自觉的精神,深深扎根于浙东区域经济社会生活,则培育出了浙东地区世代相传的经世务实、义利并重、励志自强、自主创新的人文精神。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就是在这种地域人文精神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二、从与湖湘、岭南、关中、温州文化的 比较中看宁波人的人文精神

虽说宁波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都具有“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但从

^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区域文化的层次来考察,可以看到这些精神在与区域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是显示着自己特有的文化色彩的。因此,通过这种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宁波人在精神风貌上的长处和短处,以利我们更好地弘扬宁波精神。

(一)从湖湘文化和浙东文化的比较中看宁波人的经世务实精神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和浙东文化的共同的文化精神。但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它们在弘扬经世务实精神中又有各自的鲜明特点。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战国时期屈原的忧国忧民、锐意革新的爱国思想一直为湖湘人所敬仰,而且这种精神在西汉时贾谊和司马迁的弘扬和倡导下更是深入人心。近代湖湘文化是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湖湘文化形成了诸多的优秀传统:一是爱国主义。古往今来,爱国主义是湖湘学派共同的政治倾向,是湖湘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湘文化的内核。二是经世致用。南宋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的理想抱负紧密结合在一起。明末清初王夫之以务实、主动、重行、思变的思想,将经世致用推向新的理论高度。三是兼容并包。湖湘文化历来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南宋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开创了湖南自由讲学之先河,也奠定了湖湘文化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基础。

千百年来,湖湘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即卓厉敢死、敢为天下先。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培育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五大人才群体,这就是: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经世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荃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杨昌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这些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湖南于中国举足轻重,五大人才群体相继出现是其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湖湘文化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与湖南处于内陆省份,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地理位置有直接联系。湖南东部是罗霄山脉,西部是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南面是南岭山脉,只有北面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区,交通不发达,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说法,交通极为不便,加上一直以来未曾得到开发,这种地理环境就使湖南人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造成了工商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没有沿海城市那样广阔的舞台,所以湖南人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烈。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追求“治国平天下”;从学术风气来说,都注重实际,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从个人行为来看,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有强烈的参政意识。造就政治家和军事家远比造就经济实业巨子要容易得多。

相比而言,浙东文化中讲经世致用,除了关注政治,更多的却是注重经济、注重民生。可以说,工商业一直在浙东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相比于中原

文化所具有的厚重的政治—伦理文化色彩,浙东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经济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同样渗透于浙东学术文化之中,这在黄宗羲的极具政治意义的《明夷待访录》中就可可见一斑: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不合理,首先是从维护个人的经济财产权益说起的,他主张“工商皆本”的立论依据,就是是否“切于民用”,在他的这篇光辉著作中,讲财计、讲田制、讲货币、讲税收的内容就占了相当的篇幅。

王夫之和黄宗羲都对封建专制作了尖锐批判,但两者批判的立论观念很不相同。湖湘文化的思想大家王夫之,他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始终坚守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上,肯定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天然合理性^①;他没有如黄宗羲那样,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个人独裁政治制度作全面的否定;也不可能像黄宗羲那样,提出建立全新的君、臣(官)、民关系,建立一个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高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设想。王夫之和黄宗羲这两个思想大家都是极端关心政治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却如此不同,这显然是不同地域文化环境熏陶的结果。

湖湘文化与浙东文化的这种差异,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以至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的精神,激励着湖湘弟子,塑造着经天纬地之才。社会变革宛如春雨,湖南人就如雨后春笋,他们有着满腔的热情,总是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勃发出来,在民族的危难之中显身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浙东文化的熏陶下,浙东人重商轻农,商业文化气息深厚。他们乐于经商,善于经商,而且目光远大。他们办实业、重教育,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浙东地区成为近代、现代、当代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二)从岭南文化和浙东文化的比较中看宁波人的自主创新精神

岭南文化在先秦时期形成了雏形。“先民居于五岭之南,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接受了中原文化,融合成型后始称‘岭南文化’。”^②形成时期的岭南文化由于它远离儒家中心文化,带有一点边缘文化的色彩。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一方面,岭南文化吸收和保持了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内涵。另一个方面,由于岭南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城镇的聚集地,这就使得岭南文化具有较强的平民倾向,充满商业色彩。特别是自唐宋以后,岭南佛教开始兴盛,寺院广建,高僧辈出,中外佛教交流活动活跃。因此,岭南文化又吸收了宗教的一些有益的因素,在虔诚的教化之下,使岭南文化原有的商品性得到了深化,岭南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等价交换、诚信经营企业的理念和农商并重、义利兼顾的特点。

近代岭南文化精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形成的岭南“江门学派”。“江门学派”的创始人陈献章(1428—1500),又名陈白沙,生于广东新会(即近代名人梁启超的故乡),后迁居江门白沙村。他的理论缘于“心学”,提倡独立思考,“凡事理求之吾心”。这是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② 杨匡汉,孟繁华:《1997:“大中国文学”——香港、内陆文化的现状与差异》,载《文艺理论》,1996年。